

历代散文史话

郭预衡 著

LIDAI · SANWEN · SHIHUA

先秦諸子之文，在當時成就最高、

對後代影響最大的，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。”

東魯春風，吾與點，

南華秋水，我知魚，”

講的就是《論語》和《莊子》的文章

。這些文章有個共同的特點，就是章學誠所說的

“深于比興”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历代散文史话

LIDAI · SANWEN · SHIHUA

郭预衡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代散文史话/ 郭预衡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8.12

ISBN 978-7-5059-6138-8

I. 历… II. 郭… III. 古典散文-文学史-中国
IV. 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2144号

书 名	历代散文史话
作 者	郭预衡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 刘 旭
责任校对	师自运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三河九洲财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26.25
版 次	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138-8
定 价	39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 言

中国历史悠久,散文遗产丰富。书名《历代散文史话》,其实谈的并不全面。有些地方还没有谈到,未免名不副实。虽然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名实相符者本来不多,一个书名,也许不算什么,但我还是愿意作些补充,概括谈谈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,作为本书的序言。

这里且从殷商谈起。

殷商时期的散文,就《尚书》里的“商书”来说,可靠的只有《盘庚》三篇。这三篇文章虽然不无后来增益的成分,但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面貌,具有当时文章的特点。这特点是什么呢?曾经有人认为,其中用了很多比喻:“若颠木之有由蘖”,“予若观火”,“若网在纲”,“若农夫服田力穡”,“若火之燎于原”,“若射之有志”,如此等等,很富于形象。但富于形象,乃是先秦散文共同的特征,殷商之文还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?一经比较,我以为殷商散文,以《盘庚》而论,是有自己的特点的。这特点就在于:“恪谨天命”,

“勉出乃力，听予一人之作猷！”从这些话看，特点就是靠天发令，简单命令。这一特点是和殷商的政治状况有关的。当时正当奴隶主专政的盛世，有恃无恐，发号施令，比较简单。

到了周朝，文章的特点有了变化。拿《尚书》的几篇“周书”来说，就不仅是靠天发令了。周公告诫成王的话，都是谆谆教诲，以《无逸》而论，其中虽然也讲天命，却更多地讲到了人事，讲“保民”多于“敬天”，特别是常讲以殷为鉴，讲君子要“先知稼穡之艰难”，如果“生则逸，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是从”，那就有亡国的危险。西周的几篇诰命之文，主要特点就是善于说教，用历史经验说教。这一特点也同西周的政治状况有关。西周虽然也是盛世，却已看到庶民可畏，因此，诰命之文，谦恭戒惧，不似殷商那样简单。

到了春秋之世，文章的特征又有变化。这时王纲解纽，政在诸侯，诸侯相争，不仅靠打仗，还要靠外交。于是大夫行人，尤重辞命。《左传》一书就是记录了大量的外交辞令的。其中最突出的是郑国子产的辞令。当时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，子产身为执政大臣，左右应付，相当困难。但也正是在这困难的条件下，他出色地进行了外交活动。虽然不能以武力克敌，却往往以口舌制胜。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，“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”。他的辞令曾经得到当代权威人物孔子等人的称赞。正是这样的辞令，成了《左传》文章的重要特征。当然，这时善于辞令的不止子产，也不止郑人。但郑人善于辞令，最为突出。还有一个邓析，也是郑人。此人能“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辞”。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洧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有溺者。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之，其人求金甚多。以告邓析。邓析曰：“安之，人必莫之卖矣。”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。邓析又答之曰：“安之，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”

这是说,卖尸者索价甚高,买尸者向邓析请教。邓析说:“没事,你不买,他卖不出去。”卖尸者也向邓析请教,邓析又说:“没事,他不买,别处也买不到。”这大概就是“两可之说”,“无穷之辞”。但可惜的是,邓析的著作已经失传,否则,他的辞令一定相当可观。

到了战国,文章的特点变化更大。百家争鸣,驰说云涌。“家挟飞钳之术,人持弄丸之辩”,诸子百家,无不长于辩论。孟子是号称“好辩”的,他自己也不否认。至于纵横家苏秦、张仪、陈轸、公孙衍之流,其逞辞善辩,更不待言。由于争鸣和论辩,语言的表达能力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例如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有这样一段:

啮缺问乎王倪曰:“子知物之所同是乎?”

曰:“吾恶乎知之!”

曰:“子知子之所不知邪?”

曰:“吾恶乎知之!”

“然则物无知邪?”

曰:“吾恶乎知之!虽然,尝试言之: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?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?……”

像这样的文章,在运用语言的艺术方面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。有人说庄子之文是诡辩,我以为不然。正是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战国之文长于论辩的突出的特点。

战国之后,是秦的一统天下,但“秦世不文”,这里可以不论。

到了汉代,文章的特点又不同了。汉朝的一统天下,长达数百年之久,其间文章不无变化,想用只言片语概括其特点,当然有些困难。但我仍然觉得,其主要特点也有两个。一是歌颂,一是牢骚。歌颂包括讽谏,牢骚包括诽谤。古来有句联语说:“西汉文章两司马”。我以为,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正是代表了汉文特点的两个方面。司马相如的《子

虚》、《上林》固然是歌颂，《封禅文》更是歌颂。至于有所讽谏，那是曲终奏雅。司马迁的文章，不仅《报任安书》是牢骚，全部《史记》都充满着牢骚。前人说是“谤书”，没有说错。当然，《史记》也称“实录”，但要知道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“实录”就是“谤书”，说实话就是诽谤。汉代文章产生这样两个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，尤其是在汉初，当战国纷争、秦政烦苛、楚汉相持之后，大乱之余，人心思治。作者秉笔为文，态度都很积极。歌颂固是效忠皇朝，牢骚也并非忘怀世事。真正消极遗世者，没有牢骚。

到了魏晋，文章特点又自不同。汉魏之际，魏普之际，晋宋之际，“通脱”、“清峻”，“师心”、“使气”、“和平”、“平淡”，表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，显示了不同的艺术特征。最能代表此期文章特点的作者是嵇康、阮籍和陶渊明。阮籍写过一篇《大人先生传》，有人说其体出自汉人的“设问”，其实不然。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无君而庶物定，无臣而万事理。”“无贵而贱者不怨，无富则贫者不争”。嵇康有一篇《太师箴》，应该是讲一些太师的供职之道的，但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刑本惩暴，今以胁贤。昔为天下，今为一身。下疾其上，君猜其臣。丧乱弘多，国乃陨颠。”阮、嵇二人的这类文章都可以通向鲍敬言的“无君论”。当然，陶渊明的文章是写得和平的。《五柳先生传》、《桃花源记》，都可谓平淡得很。但是，仔细推敲，则“无怀氏之民”，“葛天氏之民”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如此等等，也就近于“无君”了。

到南北朝，文章更崇骈俪，从形式看，当然也是特点。但从实质来说，骈俪只是形式，特征不尽在此。所谓“六朝文”者，突出的特点，在我看来，恐是文人之“无特操”，行文之“元拘忌”。最有代表性的作家，我这里且不举江鲍徐庾，而偏举一个张融。张融曾说自己的文章“不阡不陌，非涂非路”，“无师无友，不文不句”，可是“颇有孤神独逸”。这样的文章究竟如何呢？他有一篇《遗令》，可以为例。其文云：

吾平生所善，自当凌云一笑。三千买棺，无制新衾。左手执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，右手执小品《法华经》。妾二人，哀事毕，各遣还家。

这样的文章，正如其人，“不可无一”，亦“不可有二”。虽然不能代表六朝一切文章的特点，但从“无特操”、“无拘忌”看，则相当典型。

六朝以后，文章要推唐宋。唐宋所作，号称“古文”。这时的古文家大抵都是因好古人之道而为古人之文的。所谓“文以载道”，当然可算新的特点。但在我看，唐宋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是“载道”，而是好发议论。这是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些关系的。唐太宗的政策比较开放，宋太祖更加优待文臣。台谏可以风闻言事，文人可以制策得官，而很少（不是没有）以口舌得罪。因此，许多作者都遇事敢言，形成文字，也就长于议论了。有的作者，不仅长于议论，而且敢发狂言。在唐宋两代，出过几个狂士。首先一个是元结。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，此人“性不谐俗”，“迹涉诡激”。自称“浪士”，又称“聱叟”，或称“漫郎”。颇近古之狂生。所为文章，狂而且迂。其《处规》、《出规》、《恶圆》、《恶曲》，都是迂得可以的。后起的古文大家韩愈，也是遇事敢言，发为文章，不免狂妄。其《论佛骨表》，就是相当狂妄的文章。到了宋代，以狂见称的有柳开。作《补亡先生传》，自命为圣人。叶适就说他有“藩篱未涉之狂气”。柳开之外，王禹偁、尹师鲁，都以议论见称。至于一代大家欧阳修，其“果敢之气，刚正之节”，也都是“见于议论”的。还有，宋人之好议论，不仅在于论说之文，有时游记之文，如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。也几乎通篇议论。这是一时风气，有人说是缺点，我则看作特点。

金、元之文，大抵师承两宋，有成就却没有多少特征。

明人之文，出现特征，也在晚期。在早些时候，无论是前七子、后七子，唐顺之，归有光，也无论是法秦汉，学欧曾，都还不算自己的特点。七子、归、唐，非无成就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尽管要载古人之道，写古人之文，而古人之道已被唐宋作者载完，古人之文也被唐宋作者写完，他们

已经无道可载、无话可说了。

正当无道可载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“性灵”。于是“独抒性灵”，成了一代风气。此风一开，也就有了特点。所谓明人“小品”者，尽管有些只是“小摆设”，却也是前世少有的。

到了清代，文章的特点，不大好谈。接二连三的文字狱，要写文章，不但无道可载，连明人那一点性灵也没有了。这时期有些文人学者，不作“代圣贤立言”的“八股”，便做名物训诂的学问，讲“汉学”，讲“宋学”，做考证，虽写文章，也都不能算是自己的特点。这时可以勉强算作一代特点的，恐怕还是桐城派的文章。桐城派作文章是讲究“义法”的，按照“义法”写出来的文章究竟应该什么模样，我不很清楚；我只看到，他们的功力很深，文章写得十分工整，没有什么毛病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，大概可算典型。人们知道，方苞是受“南山案”的牵连入狱的，“身非木石”，未必好受。如果是司马迁，不知要发泄多少愤激和不平。但在桐城义法的指引下，方苞的文章竟写得如此矜慎，好像他只是一个旁观者，连一句牢骚都没有。这一点实在难能。

在清代，这样的文章大概是最合时宜的了，炉火纯青，这当然也应当是一代文章之特征。

但是，文章作到这个地步，有如蜡制美人，也就没有多少生气了。于是物极而反，到了近代，文章便发生了更大的变革。最先发生的，是梁启超的“新文体”。其特点是“纵笔所至不检束”，是“笔锋常带情感”，一反桐城义法。这样的文章，在当时的影响曾是不小的。不过，梁启超也是一个先行者，先行者常不免于简单片面，再说，此公思想又曾一度逆转，从维新转向保皇，一开倒车，这样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。

但文章的变革是一发而不可收的，划时代的变革，是“五四”的散文和文风。这方面我谈过不少，此处不再多谈。

目 录

1 / 序 言

1 / 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

——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之文

9 / 史家之笔 策士之辞

——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之文

17 / 《左传》的思想和文章

31 /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

50 / 秦汉文章之变迁

70 / 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

——司马迁行文的特征

76 /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

94 / 汉赋的发展、变化和特征

105 / 六朝文说·总叙

121 / 八代文风和曹操

126 / 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

131 / 六朝文三题

162 / 北朝文三题

- 181 / 杰出的散文家韩愈
- 198 / “谀墓之文”和“以文为戏”
——韩文异议
- 203 / 从元结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
- 209 / 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
- 230 / 欧阳修的文风、学风和书风
- 235 /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
——读欧阳修散文随笔之一
- 243 / 读欧阳修的《论尹师鲁墓志》
- 252 / 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
- 262 / 行云流水 姿态横生
——读苏轼散文随笔之一
- 268 / 苏轼《教战守策》的论说艺术
- 274 / 曾巩为人和为文的特征
- 280 / 金元散文简论
- 310 / “前七子”的复古与“何景明”的文风
- 316 / 归有光文章别解
- 323 / 从王阳明到袁中郎
——明代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
- 336 / 桐城派的理论和实践
- 352 / “五四”散文与文风
- 365 /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
- 371 / 千古文章重“白描”
- 374 / 汉语文章传统的语言特征和风格特征
- 389 /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
- 407 / 后 记

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

——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之文

先秦诸子之文，在当时成就最高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，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。“东鲁春风‘吾与点’，南华秋水‘我知鱼’”，讲的就是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的文章。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章学诚所说的：“深于比兴”，“深于取象”。（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下》）也就是善于运用比喻，能够引物连类，阐明道理；即使是讲抽象的理论，也都富于形象。不但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，（《易教上》）而且很少离开形象而说理。理论富于形象性，本是先秦散文的一个共同的艺术特征，而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又有突出的特点。

《论语》是先秦儒家的主要著作。书中主要是记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，据说是孔子死后，“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，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。

孔子是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中一个最有影响的改良派。在政治上，有人说他是复辟奴隶制的，但当孔子在世的时候，奴隶制还没有真正瓦

解,因此,与其说是“复辟”,还不如说是“改良”。因为,从他所表述的政治理想看,他不是简单地恢复商周的旧制度,而是要有所“因革”、有所“损益”的。他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,政治理想是“仁政”,用“仁”来缓和阶级矛盾,用“仁政”来挽救奴隶社会的灭亡。这种思想在《论语》一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。

从思想实质说,《论语》一书、特别是其中一些论政的文字,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;但孔子不仅是个政治上的改良派,他又是个多才多艺、很重视辞令、说过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的人,因此,《论语》一书,在表达思想的艺术上就很有特点,非常富于文采。有的语言极为凝练,富于形象,且含有哲理。例如《子罕篇》记载“子在川上曰:‘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’。”就是很有特征的语言。虽有大量的说教,但不是板着面孔说教。有的篇章很带感情色彩。例如《季氏篇》讲季氏将伐颛臾,冉有和季路去见孔子,说: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孔子一听便道:“求,无乃尔是过与?夫颛臾,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,且在邦域之中矣,是社稷之臣也,何以伐为?”冉有说:“夫子欲之,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于是孔子更发怒道:“求!周任有言曰:‘陈力就列,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则将焉用彼相矣?且尔言过矣,虎兕出于柙,龟玉毁于椟中,是谁之过与?”再往下,孔子更为激动,文章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。此外,有的篇章还能够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的故事之中。不仅形象鲜明,而且情节生动。其中最完整的例子是《先进》篇里的“侍坐”一章。

这一章写的是子路、曾晰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孔子首先发问,说:“以吾一日长乎尔,毋吾以也。居则曰:‘不吾知也!’如或知尔,则何以哉?”这是让四个学生各言其志。

子路比较直爽,马上对答: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,由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。”

孔子听罢,微微笑了。然后又问冉有和公西华。两人回答,孔子没有表态。最后,问到曾晰,文章是这样写的:

“点，尔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伤乎，亦各言其志也。”

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“东鲁春风吾与点”，指的就是这段文字。在这里孔子赞许了曾晰（点）的话，但孔子赞许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曾晰说的几句话，全是“取象”，并未说理，其含义和子路等所说有何不同呢？对此，历来的学者曾有不少分歧的解释，这里不必多说。我认为曾晰的这番话是用一幅太平无事的景象来表达一种生活理想，从而暗示了他的志向。孔子在战乱的年代中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太平的社会生活，因此，一听曾晰的话，便立刻表示赞同。

当然，这样的社会生活不是可以坐而等待的。其实现还要靠政治活动。因此，孔子赞成曾晰的志向，却也并不否定子路等人的志向。当曾晰问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”时，孔子的回答是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那么，为什么笑子路呢？孔子说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很清楚，孔子并非笑子路讲“为国”，而只是笑他“不让”。因此，当曾晰弄不明白而又再三提问时，孔子便又反复作了解释。

这篇文章近来也曾有人认为是表达了孔子晚年消极避世的思想，我看不是。孔子的政治态度始终积极，这是他为人一贯的特征。孔子和他的门人虽然也说过行藏取舍的话，如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（《述而》）之类，但孔子的“藏”，不等于消极的“隐”，而是等待时机，志在守“道”。这里说的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”，其所作所为，也绝非隐者的行径。对于隐者、对于避世者，孔子及其门人是自有看法的。这在《论语》一书中也有专章描述。例如《微子》篇写长沮桀溺耦而耕一章：

长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

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。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耒而不辍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，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长沮桀溺是何许人？前人的说法很不一致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叙此事于孔子去叶反蔡之时，好像长沮桀溺实有其人，而子路问津也实有其事。金履祥《论语集注考证》说：“长沮桀溺名皆从水，子路问津，一时何自识其姓名？谅以其物色名之，如荷蓐、晨门、荷蓐丈人之类。”后来俞樾也有类似的看法。这虽然否定了长沮桀溺是真名真姓，可是仍然肯定确有其事其人。

依我看，这段文章恐是虚构。不仅长沮桀溺并非真名真姓，就连其人其事也未必实有。《论语》的编者为了表达儒家主张积极用世、反对消极避世的思想，于是便“取象”于长沮桀溺，假借他们的言论，发表自己的主张。一问一答之间，对于避世的思想进行了巧妙的驳斥。

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云云，我看也不是随便一说，而是有所针对，很可能是针对庄周一派讲的。庄周一派是主张“同与禽兽居”（《马蹄》）的，而孔子不然，他是不肯离开“斯人之徒”而避世的。“斯人之徒”指哪些人呢？我看曾晰所说的那“冠者五六人、童子六七人”，大概也就都在其内。

司马迁给庄子立传时，曾说《庄子》一书“大抵率寓言也”，其中“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”。这话说得不错。但可惜，司马迁对于《论语》的个别篇章却没有提出类似的看法。其实，长沮桀溺何尝不

是畏累虚，亢桑子一类？这些人物，可能都是“子虚”、“乌有”，都是行文之际、“深于取象”而虚构出来的。

在先秦诸子中，最“深于比兴”、“深于取象”的文章，还得首推《庄子》。《庄子》一书包括内篇外篇和杂篇。有人说内篇是庄周自著，外杂各篇出于后学之手。其实古人著书，师徒相继，本来不必出自一人，成于一手，才算一家的著作。今天看来，尽管全书思想比较驳杂，文风也不尽统一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大量地运用寓言、运用形象说理。这是《庄子》文章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。

庄子也是奴隶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但他和孔子不同，他不是积极用世，而是消极避世。对于当时濒于灭亡的奴隶社会，他不是力图挽救，加以改良，而是愤世嫉俗，全身自保。孔子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他是知其不可而“无为”的。他的思想和老子也不同。《老子》一书虽然也主张“无为”，目的却在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；而庄子，则是真的愤而不为了。

像这样的人物是不是真的隐者呢？按照鲁迅先生的看法，真正的隐者是没有文章的。他们既然写出文章，可见也还没有真的忘掉人世。他们对于人世大概怀着很多不满的情绪，而又“以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，于是就发为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形成了“瑰玮”、“参差”、“谲诡可观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的文章了。

一篇《逍遥游》，是《庄子》文章的代表作。关于这篇文章的思想，从古到今也有过各种各样的诠释，但我的看法比较简单，我以为分析思想，不能离开政治。这篇文章不管它“取象”多么离奇怪诞，而根本思想则不过是要在乱世之中求得逍遥，此外别无深意。这种思想也不是难于理解的。这乃是庄子这流人物在战国时期饱经篡乱之后、于无限愤慨之中得出来的处世之道。当然，其所追求的“逍遥”，在人间世里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，只能设想于“无何有之乡、广漠之野。”这当然只是一

种想要摆脱现实的幻想。

这种摆脱现实的幻想是产生于对于现实的否定。这篇文章认为现实是不可为的,对于“知效一官、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、而征一国者”,是很看不起的;对于“尧治天下之民,平海内之政”,是很不以为然的;对于“小知”和“大知”,“小年”和“大年”,也都认为是不足辩的。总之,对于当时的社会,可以说是看穿了一切,也否定了一切。于是就一切不为,只以养生免害为事。文章所肯定的,是那“无用”的“大树”,“不夭斧斤,物无害者。”“无所可用,安所困苦哉?”这就是庄子处世为人的根本态度。

这种态度当然是够消极的了,但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没落者,倒也不足为怪。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:像这样的思想,形之于文章,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没有呢?除了“深于取象”之外,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?

我认为,作为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没落者,在新旧两个剥削阶级的斗争中,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,庄子一流对于人情世态的观察和批判,有时也并非全无可取。即以《逍遥游》中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一事而论,庄子对于这种虚拟的传说故事的批判,就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凭着现实的经验,庄子认为所谓“治天下”,其实乃是出于贪心,而所谓“让天下”,其实也是为了沽名。这一看法,显然是针对现实,有所为而发的。他说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”云云,这也不应只是作为“极端个人主义”或“利己主义”来解释,我看这也是“以天下为沉浊”而有所愤激才说的话。

庄子一派还曾经看到: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,诸侯之门,而仁义存焉。”(《胠篋》)这个看法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可以说是相当深刻。如果不是积有较多的历史经验,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。也正因此,《庄子》一书才对传统的典章制度、伦理道德都作了无情的否定。当然,由于作者的阶级偏见,凡所否定,也不都是恰当的。

庄周等人一方面是奴隶主阶级的没落者,另一方面,他们和儒家同